

書法研究



总第一二八期

魏 晋 南 北 朝 书 法 研 究

魏晋南北朝时期特殊的社会环境对书法产生的影响
试论《泰山刻石》的文字规范与艺术特征

论唐太宗对王羲之书法之推崇

朱文长与《续书断》

《东坡题跋》中的书学思想初探

论吴门书派的领袖——祝允明

赵宦光资料整理与考略

傅山的侠义精神与书法精神

曾熙生平交游考略

書法研究

总第一二八期

魏
晋
南
北
朝
书
法
研
究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魏晋南北朝书法研究 / 上海书画出版社编. - 上海:
上海书画出版社, 2005.12
(书法研究)
ISBN 7-80725-226-X

I. 魏... II. 上... III. 汉字 - 书法 - 中国 -
魏晋南北朝时代 - 文集 IV. J292.112.3-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5)第157575号

主 编: 卢辅圣
副 主 编: 沈培方
责任编辑: 江 宏
庄新兴
责任校对: 倪 凡
封面设计: 王 崢
技术编辑: 吴蕃中

魏晋南北朝书法研究

本社编

◎ 上海书画出版社 出版发行

地址: 上海市延安西路 593 号

邮编: 200050

电话: 61229010

网址: www.duoyunxuan-sh.com

E-mail: shcph@online.sh.cn

上海出版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850 × 1168 1/32 字数: 9 0 千字

印张: 4 印数: 1-3,000

2005 年 12 月第 1 版 2005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ISBN7-80725-226-X/J · 199

定价: 6.00 元

目 录

- 1 吴慧平 魏晋南北朝时期特殊的社会环境对书法产生的影响
- 21 沈晓英 试论《泰山刻石》的文字规范与艺术特征
- 32 钱建华 论唐太宗对王羲之书法之推崇
- 40 刘文秋 朱长文与《续书断》
- 52 周 斌 《东坡题跋》中的书学思想初探
- 65 向 彬 论吴门书派的领袖——祝允明
- 82 赵彦辉 赵宦光资料整理与考略
- 99 杨吉平 傅山的侠义精神与书法精神
- 109 冯文华 曾熙生平交游考略

魏晋南北朝时期特殊的社会环境 对书法产生的影响

吴慧平

[内容提要]

艺术文化是社会意识形态的一种反映,离不开社会政治环境 and 经济基础。魏晋南北朝书法艺术的发展离不开相关文化及时代背景的影响。本文认为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多元发展为书法的区域差异奠定了物质基础,门阀制度的形成、世家大族的出现为书法的发展提供了人才保证,玄学的兴起为书法的发展提供了理论上的支持,佛教、道教的兴盛扩大了书法传播的范围,商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带来了书法品评、收藏的社会风气。

[关键词] 魏晋南北朝 门阀制度 世家大族 商品经济

魏晋南北朝是长期分裂的时代,是战乱频繁的年代,也是割据政权不断更替的时代。这个时期,史学家习惯于从建安年间

(196—219)算起,至隋开皇九年(589)灭陈止,前后将近四百年的历史。在这四个世纪中,除了在西晋时短暂地统一(约37年)外,全国上下长期处于分裂割据状态,先后建立了大小三十五个政权。各政权之间相互争夺势力范围,战乱不已,政治风云变幻莫测,整个社会动荡不安。

艺术文化是社会意识形态的一种反映,离不开社会政治环境 and 经济基础。魏晋南北朝书法艺术的发展离不开相关文化及时代背景的影响。法国艺术史家丹纳说:“自然界有它的气候,气候的变化决定了这种那种植物的出现。精神方面也有它的气候,它的变化决定这种那种艺术的出现。”^①魏晋南北朝时期书法正是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下面我们拟从以下几个方面探讨对魏晋南北朝书法艺术发展产生重大影响的因素。

一 政治、经济、文化的多元发展为书法的区域差异 奠定了物质基础

我国古代艺术的发展均建立在农耕经济的基础之上,经济环境的发展直接影响到政治环境和文化环境。因此,每个朝代文化环境、政治环境、经济环境的差异均能对中国的书法产生不同的影响。不管是字体的异同,还是书写载体的选择以及时代风格的差异都会若明若暗的熏染上时代背景的色调。从中国五千年来的历史发展来看,农业发达的区域多半就是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如秦汉时期的长安、洛阳一带。政治中心的存在又必然会吸引和凝聚一大批文化艺术人才,从而形成艺术文化的中心。在中国古代政治、经济的中心往往又是艺术文化的中心。秦王朝时期,在全国实行郡县制,地方官吏均由中央政府任免。除岭南、西南有着几个少数民族政权外,整个黄河流域与长江流域只有一个政权,全国只有一个政治、经济、文化中心——长安一带。到了两汉时期,岭南、西南的少数民族政权不复存在,国家达到了空前的

统一。西汉末年和东汉初年，曾经出现过一段分裂割据的状况，但是时间很短。可以说，整个秦汉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均在中原地区。洛阳、长安一带也就成为了当时文化艺术的中心。当时以战国时秦国所置的函谷关为界，分为关东、关西两个经济文化区。据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的记载：“夫山西饶材、竹、谷、笋、旄、玉石。山东多鱼、盐、漆、丝、声色。江南出楠、梓、姜、桂、金、锡、连、丹砂、犀、瑇瑁、珠玑、齿革。龙门、碣石北多马、牛、羊、旃裘、筋角。铜、铁则千里往往山出棋置。此其大较也。”这里所指的山西、山东便是关东、关西地区。秦汉时期，关中地区因处于全国的政治中心。秦及西汉两代，推行“实关中、戍边郡”两种遗民政政策。前者是把较远地方的一部分人口财富，移置到关中盆地。后者是移民实边，巩固西北的边防。这一政策的推行使得关中地区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位于关中地区的咸阳、长安已经成为当时全国最大的城市。故司马迁说：“故关中之地，于天下三分，而人众不过什三，然量其富，什居其六”。^②秦汉时期，平原沃野、膏壤千里的关东农业生产发展地区，更是以东汉首都洛阳为中心的经济都会地区。秦汉以来的以长安、洛阳一线为中心的政治、经济、文化区域为艺术文化的发展提供了土壤。从中国书法发展的历史可以看出。著名书家的活动大都离不开政治中心所在。秦代的李斯，在文字的改革和书法发展上都有一定的功绩。后世称赞其小篆“朴茂”、“端庄”，“画如铁石，字若飞动，作楷隶之祖，为不易之法。”作为秦国的宰相，他主要活动于秦都咸阳一带。又如汉代熹平四年（175），灵帝刘宏批准著名书法家蔡邕“正定六经”的建议，由蔡邕和堂谿典等写定“六经”文字，部分由蔡邕书丹上石，使能工镌刻，立于太学门外，世称“熹平石经”。立碑之初，每天前来观看及摹写者，堵塞街巷。灵帝还下诏征集天下工书者集于鸿都门，一时间善书者纷至沓来，应召的有数百人之多。蔡邕、师宜官、梁鹄等人，都是鸿都门下的著名书家。小篆和汉隶的出现无不体现出秦

汉时期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一元化而带来的国家的统一与唯我独尊的气势。

魏晋南北朝时期，这种情况发生了变化。东汉末期，群雄割据，汉献帝已徒有其名。接着三国政权的鼎立，这种象征性的统一政权也消失了。三国之后的西晋统一了中国一段时间。但其内部既有八王之乱，边疆又有少数民族的豪酋割据，统一政权形同虚设。不久，西晋灭亡，北部中国出现了少数民族政权割据时期，由汉国到前赵，又由前赵到后赵，加上前秦、前燕、前凉与成汉，或前后替代，或同时并存。前秦曾统一过北部中国，旋即瓦解后北部中国又陷入四分五裂的局面。进入南北朝时期后，北方被北魏统一，其后分裂成东魏、西魏，再后形成北齐、北周的对峙。南朝有宋、齐、梁、陈的嬗递。在西晋之后的近二百八十年间，由于南北方一直处在不统一的情况下，从而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多元化得以形成。北方曾经形成了河西走廊的姑藏（今之武威）、关中的长安、中原的洛阳和山东的邳城四个统治中心。南方则形成了建康、江陵两个统治中心。益州的成都，由于交通的不便，区域优势明显，一直以来都是半独立的统治中心。秦汉时期，以洛阳、长安为统治中心的状况不复存在了。随着统治中心的多元化，政令的传播与行政区域的划分必须以此为依据；也使得水利的兴建、驿道的系统、城防及关隘的布局，也必须服从于当时统治中心多元化的政治需要。久而久之，在经济文化方面，也逐步形成了同统治中心多元化相适应的经济和文化的多中心状况，以至在当时人的气质、文风、生活习惯和个人好尚等方面，形成了区域差异。这些区域差异的形成反过来又影响着政治上的分裂局面和统治中心多元化的持续发展。这种局面的出现，打破了一贯由中原地区的汉族占据历史舞台的局面，给少数民族登上中原地区的历史舞台和发挥其政治、军事、经济、艺术才能提供了条件。中国艺术文化中心开始出现多元化的割据，中原汉文化艺术中心开始南移。“永嘉之

乱”的结果直接导致了北方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地位的衰弱。随后的“五胡十六国”的混乱纷争局面使得当时的名门贵族纷纷南北迁徙。书法艺术的区域发展尤为明显。曾受业于卫觊的江琼、江统，以及崔悦、崔潜父子等人，避处北方，因而卫觊的笔法得以在北方流传；大士族王导“以师钟（繇）、卫（瓘），好爱无厌，丧乱狼狽，犹以钟繇《尚书宣示帖》藏衣带中。过江后，在右军处，右军借王敬仁……”^③于是钟繇的书迹流传到了江南。随着东晋、南朝江南地区社会的稳定，经济的开发与发展，使得一个新的艺术文化中心在崛起。涌现了如王羲之、王献之、羊欣、王僧虔、萧子云、智永等一大批著名的书法艺术巨匠。它是魏晋南北朝时期一个突出的文化现象。不仅书体完备，风格地区差异明显，艺术也堪称造极。“书圣”王羲之和“晋字、唐诗、宋词、元曲”之说便是明显例证。

二 门阀制度的形成、世家大族的出现为书法的发展 提供了人才保证

魏晋南北朝时期世家大族的出现，与当时的门阀制度的形成是分不开的。东汉时期，在统治阶级集团中已经出现了时代相袭的特权阶层，他们屡代为官、富甲乡里、纠集宗族、垄断文化、门生故吏遍布天下。其内部之间的等级差别也逐渐明朗与日益严格。到了曹魏时期，正式制定的“九品中正制”，确认了做官以门第高低为准则；而门第的高低则以世官、本人的官阶及其婚姻关系为依据。最终便形成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的状况，进一步为统治阶级的士、庶之分确立了政治基础。进而占田、占客法令的颁行，使得早已存在的占田以为私有、占客以为私属的世族地主土地私有制和佃客部曲制，获得了法律的许可而合法化。一整套维护世族地主阶层利益的门阀制度得以形成，世家大族得以出现。世家大族又指士族，它是指汉末至魏晋南北朝时期权势极大，可以左右当时朝廷和政治经济形势的豪门家族。它是一个综合性的概

念,具有多方面的内涵。政治上的累世通显、经济上的大土地和劳动力的私人占有,以及文学上的家学传承是世家大族的基本特征。魏晋时期的书法繁荣与此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从某种程度上说,书法艺术的繁荣以世家大族为基础。没有世家大族的出现,也就不可能有魏晋时期书法世家的出现,也就没有书法艺术的繁荣。当时的世家大族正如唐人柳芳所云:“过江则为侨姓,王、谢、袁、萧为大;东南则为吴姓,朱、张、顾、陆为大;山东则为郡姓,王、卢、崔、李、郑为大;关中亦号郡姓,韦、裴、柳、薛、杨、杜首之;代北则为虏姓,元、长孙、宇文、于、陆、源、窦首之。”^④大致可以分为江南世族、北方郡姓、鲜卑军事贵族三大区域。

著名书法家的出现,必须满足以下几个条件:第一,书法作为一门高雅艺术,首先必须致力于上层社会的需要,上层社会的承认与否直接关系到书法作品的传播范围、书法声誉的大小,著名书法家一般有着深厚的家庭背景。第二,书法作为一门艺术,没有一定的物质基础难入此门。书法家的成长必须以雄厚的财力为支撑。物质基础一方面受制于当时社会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决定于世家大族对本族子弟学习书法的支持与否。第三,书法还是一门技巧性很强的艺术,不仅需要大量的时间进行实践,还需要师徒相授,父子相传。除此之外,书法又是一门涉及古文字学、文学等学科的艺术,需要“字外功”的滋养。书法的产生一开始就是以实用为主,它与古文字学的关系极为密切,不懂文字学,在古代是称不上书法家的。书法的内容决定了书法和文学的关系。因此,古代的书家绝大多数都精通文字学,文学功底也极为深厚,多半出身于书香门第之中。

魏晋南北朝时期九品中正制的实行和门阀制度的兴起,世家大族作为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一个特权阶层,有着优越的条件和精力从事文化事业。首先他们在政治上的“累世通显”使得他们具有很高的政治权力,尤其在东晋,世家大族的政治势力尤显。东晋司

马氏之所以能苟安江南，是与王导为首的世家大族的支持分不开的。元帝登基接受百官朝贺时，竟邀王导同坐御床，此所谓“王与司马，共天下”。当时王、谢两家的声望最显，后来“王谢”竟成了高门大户、有钱有势人家的代称。唐刘禹锡《乌衣巷》云：“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几代为高官的世族称为“右姓”、“茂姓”，这些在本地成为“郡望”。望族势力极大，就连皇帝也奈何不得。南方世族周勰起兵谋反，事败，丞相王导恐周氏家族势大，竟不予追究。《南史》卷二十一《王弘传附子僧达传》云：

黄门郎路琼之，太后兄庆之孙也，宅与僧达门并。尝盛车服诣僧达。僧达将猎，已改服。琼之就坐，僧达了不与语，谓曰：“身昔门下驺人路庆之者，是君何亲？”遂焚琼之所坐床。太后怒，泣涕于帝曰：“我尚在而人陵之，我死后乞食矣。”帝曰：“琼之年少，无事诣王僧达门，见辱乃其宜耳。僧达贵公子，岂可以此加罪乎？”

宋武帝的舅父路庆之的孙子路琼之拜访豪族王僧达，王先是“了不与语”，后又故意羞之，并令人烧掉路琼之坐过的席子。路太后闻之哭诉于皇帝，皇帝却反怪路琼之“少不更事”，不敢问罪于王僧达。世家大族的政治权力，决定了他们在上层社会中的地位，他们的兴趣爱好，是决定一门艺术得以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政治地位的优势也决定了他们极为雄厚的经济基础，这些均为书法艺术创作活动提供了必要的物质条件。

世家大族对于社会的影响，不仅仅在于经济势力与政治资本，而且还以继承传统的学术为重要条件。在“丧乱弘多”，政局跌宕，官学教育整体上处于颓废不振的情形之下，世家大族注重家风与家学的传承，一方面使学术传统得以保持，不至于丧失，另一方面也使家族子弟的精神品格得到培养，整体学术水平得到提高。正如陈寅恪先生在《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中篇《政治革命及党派分野》

中所指出：“所谓士族者，其初并不专用其先代之高官厚禄为其唯一之表征，而实以家学及礼法等标异于其他诸姓……夫士族之特点既在其门风之优美，不同于凡庶，而优美之门风实基于学业之因袭。”学业的因袭，使得世家大族的子弟在学术上往往具有很高的水平。而优美的门风，既需要深厚的学术功底，同时又要进行许多才艺技能的培养。“专守于一艺”的教育在此时期得到了迅速发展，这是当时保持世家大族名士风范、门风与家族不坠的必备因素。《颜氏家训·杂艺篇》中提到书法、绘画、射箭、算术、医学、弹琴、围棋、博弈、投壶之类，名目甚多。都是当时世家大族子弟必须掌握的技能。在这些技能中，书法和绘画最受重视。如琅邪王氏家族世代善书，出现了王羲之、王献之父子这样的“书圣”，便是这种风气影响下的结果。王氏重视书道的传授，视之为“家学”秘传。其他士族也重此艺，如河东卫氏、陈郡谢氏、颍川庾氏、高平郗氏等。正如王瑶《政治社会情况与文士地位》一文中所指出的那样：

作者在当时的社会地位确实依靠他的门阀和官位而定的：文义之事固不能说毫无关系，当确乎是很微，是间接的。我们虽然不能说名门大族出身的人的诗文一定好，但文学的时代潮流确实由他们领导着的。因为当文化和政治经济同样为他们所把持保有的时候，不只他们在学习的环境地位上方便，而且诗赋文笔等的风格和内 容，也都一定是适应着他们生活需要的。他们清谈老庄，文学上便盛行着淡乎寡味的玄言诗；他们崇尚嘉遁，文学上便有希羨山林的招隐诗。他们的作品绮丽，可以形成“俪典新声”的一般风气；他们注重事义，也可以使“文章殆如书抄”。在当时的诗文里，看不到一般社会生活的反映，因为作者们本来不需要看的；他们自己只是生活在公宴游览的圈子里。^⑤

这里谈论的是文学家与政治社会地位的关系，我们同样可以

移植到书法家的品评上来,道理基本上是相通的。通观魏晋南北朝书法史,主流书风一直为世家大族书家的“二王”领导着。其间发生由“大王”到“小王”的转变,始作俑者乃好古尚文的南齐竟陵王萧子良,推动者是梁武帝萧衍,示范者是士族书家萧子云,基本上都是以高门书家为宗师。魏晋南北朝时期,历史上有影响力的书家无一不出自世家大族。

由上所述,魏晋南北朝世家大族的出现,无论是经济、政治,还是学术、技能等方面均为书法的发展奠定了物质条件,为书法世家的出现奠定了人才基础。

三 玄学的兴起为书法的发展提供了理论上的支持

曾于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的诸子之学,经过秦始皇的“焚书坑儒”之后,仍然不断流传。西汉建立之后,百家思想逐渐复兴。西汉初年,由于长期的战争苦难,社会经济严重破坏,老百姓都希望有一个休养生息的环境,因此黄老的清静无为思想成为了汉初的指导思想。经过了几十年的休养生息,西汉的国力得到了很大提高。公元前140年,汉武帝即位不久,董仲舒向汉武帝建议:

《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宜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⑤

汉武帝接受了其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于是儒家学说便成为了统治阶级的主导思想。儒家学说是一种以伦理作为基础,糅合阴阳五行之学而成。提倡“仁、义、礼、智、信”以及“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所谓“三纲五常”等一套伦理规范,以阐发圣人的微言大义为己任,“齐国修身平天下”乃是当时士人所向往的典范。两汉时期,儒学已经取得了独尊、一统的地位。东汉末年

黄巾军起义，天下大乱；继之豪强割据，争斗不已。社会的动荡，政治的变幻莫测，使得人们不得不对因名立教的儒学进行深刻的反思。许多知识分子饱尝了离乱之苦之后，儒家的王道学说在人们思想中的“至尊”地位开始动摇。曹魏集团的你争我斗，使许多名士转入了斗争漩涡之中。在这样的情况之下，许多知识分子不满现实而又惧怕祸害，转而采取逃避现实、明哲保身的态度，悉心研究“三玄之学”，“玄虚淡泊，与道逍遥”。玄学因此产生。

玄学的兴盛开辟了一个思辨时代，名士们剖玄析微，“注而不竭”，“兼辞采丰蔚，甚足以动心骇听。”由此形成清谈风格。清谈，亦称“清言”或“玄言”，上承汉末清议，从品评人物转向以谈玄为主，用老庄思想诠释儒家经义，摈弃世务，专谈玄理。由魏、晋延及齐、梁，士人争相模效，往往“高人乐遗世，学者习虚玄”。玄学的兴盛，使得书法的品评在儒家学说的束缚之下解放出来，对魏晋书法的繁荣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当人物的品评从以道德、操守、气节为主要内容，转向人的才情、气质、格调进而深入到人物的容貌、言谈、举止与精神状态等之后，对于书法艺术的评价也流风所及，出现了以人物的容貌、仪态、精神、举止等来形容书法的文章。在书法艺术的品评中，最为典型的是梁庾肩吾的《书品》、袁昂的《古今书评》了。如梁内侍中、尚书令袁昂的《古今书评》所论古今书家二十五人，皆能善书。其关于书法风格的描述均与人物精神风貌联系在一起，今列举数条：

王右军书如谢家子弟，纵复不端正者，爽爽有一种风气。

王子敬书如河洛间少年，虽有充悦，而举止沓拖，殊不可耐。

羊欣书如大家婢为夫人，虽处其位，而举止羞涩，终不似真。

徐淮南书如南岗士大夫，徒好尚风范，终不免寒乞。

阮研书如贵胄失品次丛悴，不复排突英贤。

王仪同书如晋安帝，非不处尊位而都无神明。

庾肩吾书如新亭伧父，一往见似扬州人，共语便音
态出。^⑦

近人马宗霍在《书林藻鉴》中认为“书以晋人为最工，亦以晋人为最盛。亦犹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皆所谓一代之尚也。”他认为晋人书法兴盛的原因除了继承之外，玄学的兴起是一关键。“夷考其故，盖有三焉：一则时接汉魏……一则隶奇草至……一则俗好清谈，风流相扇，志轻轩冕，情骛皋壤，机务不以经心，翰墨于是假手，或品极于峰杪，或赏析于毫芒，至乃父子争胜，兄弟竞爽，殚精以赴，疲神糜辞，以此为书，宜其冠绝后古，莫与抗行矣。”^⑧玄学崇尚的是自然，是“无极”。人人各有一种风流韵骨，这便是有名的魏晋风度。魏晋风度特别重视言行举止，“好姿容”、“好神情”，重视对人物的品格，仪表的品藻。这种品评鉴赏之风反映在书法艺术上，便是晋代的“尚韵”。儒学思想反映在书法艺术上，即注重书法艺术表现的力度，追求雄强、阳刚之美。两汉的碑刻均是如此。玄学思潮反映在书法艺术上，即注重书法艺术的韵致，追求一种秀逸、阴柔之美。晋代的行草与八分书，无不神韵异常，风度翩翩。

玄学和当时的佛学、道家学说一起，对魏晋时期书法风格的发展提供了理论上的准备，导致了晋代尚“韵”的书法氛围的出现。

四 佛教、道教的兴盛扩大了书法传播的范围

魏晋南北朝儒学的衰微，宗教得以趁隙发展。尚玄的社会风尚促进了倡言“空无”的佛教发展。佛教从东汉开始传入中国，当时虽有人信仰，但只准西域人奉祠，朝廷明令禁止汉人出家为僧。曹魏时期，汉人出家为僧者渐多，以至高僧辈出，寺庙普建。仅据《洛阳伽蓝记》所载，西晋时洛阳即有白马寺、东牛寺等大型寺庙十座，沙门甚众。佛教在中国的发展，提出对佛经译文质量的较高要

求,于是有中土僧侣的西行取经,在中外僧人的共同努力下,佛经大量译出,注疏讲经之学也随之发展,在这一过程中,佛教逐渐中国化。东晋佛学大师道安(314—385)总结汉代以来的禅法与二系学说。其弟子慧远(334—416)一方面强调佛法是“不变之宗”,著《沙门不敬王者论》,维护佛教对政治的超越性,另一方面又调和佛学与儒学名教的矛盾,用佛学融合儒玄,这是印度佛教演为中国佛教的一个开端。竺道生(355—434)则倡言“一阐提皆得成佛”之说,认为“一阐提”(“断善根”的音译,意指恶人,难救药之人)也可以修炼成佛,并首创顿悟成佛说,这都使佛教赢得更大普及性,开出中国化的佛学之路。南朝梁武帝(464—549)则以“菩萨皇帝”身份,提出“三教同源”说,把儒道释三教始祖孔子、老子、释迦牟尼并称“三圣”,认为三教可以相互辉映。此后不久,一个华化佛教宗派,天台宗在浙江天台山创立,标志着中国佛学走上独立发展的道路。

佛教在魏晋南北朝间的广泛流播,重要的物化成果,其一是寺院的广为兴建,所谓“天下名山僧占多”。唐人杜牧诗云:“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便是极言南朝佛寺之多。其实,南朝佛寺何止四百八十,仅据《南史·郭祖深传》载,梁朝“都下佛寺五百余所,穷极宏丽,僧尼十余万,资产丰沃。”其二是巨型石窟造像。在今甘肃、陕西、山西、河南、新疆、四川等地保有許多石窟和数以千计的佛像。最著名者,一为甘肃西部的敦煌莫高窟,晋太和元年(366)始建,历北魏、西魏、北周,至隋、唐、五代、宋、元各朝都在此开凿,现存石窟四百多个,佛像二千四百五十尊,为石刻艺术精品;二为山西大同云冈石窟,魏文成帝(452—465在位)时始建,几百年间开凿五十多个洞窟,现存造像五万尊;三为河南洛阳龙门石窟,始凿于北魏孝文帝迁洛后第三年(497),经东魏、北齐、北周、隋、唐诸朝,连续营造四百多年。现存佛龕二千一百个,佛像十万尊。此外,还有河北省邯郸市的响堂山石窟和甘肃炳灵寺石窟、麦

积山石窟等。胡兆量在《中国文化地理概述》中认为石窟寺主要分布于我国的北方，有着自然、历史和社会的基础：

自然环境方面，北方山体风化层较薄，植被稀疏，多晴朗天气，便于石窟开凿，也便于僧尼居住修炼。南方山体植被茂密，土壤深厚，潮湿多雨，既不便开凿，也不适宜僧尼修炼居住。

历史背景方面，石窟寺的出现与佛教传播的轨迹是一致的，循着丝绸之路，由西而东，由北而南，从新疆天山南路拜城、库车、吐鲁番，向河西走廊敦煌、安西延伸。宋、元两代，北方石窟寺走向衰落，南方石窟寺逐渐兴起。

社会条件方面，石窟寺工程浩大，需要巨额资金支持，在封建社会，皇室是最大的赞助来源……北魏首都先在大同，后迁都洛阳。大同云冈和洛阳龙门两大石窟得力于北魏皇室的直接赞助。《续高僧传·僧稠传》中记载，北魏文宣帝时，将国家财政储备的三分之一用到佛事上。^⑨

佛教的兴盛，一方面对书法人才的培养上提供了扎实的基础，扩大了书法传播的范围。因为佛经的抄写需要众多的抄手，而且在字体和字的质量上有了很高的要求。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抄经者的身份各异，有专门抄写文书的书吏，他们地位一般比较低微。汉时即有不少。如《汉书》卷九二《陈遵传》云：“即至官，当遣从史西，召善书吏十人于前，治私书谢京师故人，遵凭几，口占书吏，且省官事，书数百封，亲疏各有意，河南大惊。”二是写经生。《十地论初欢喜地卷第一》末题：“正光二年(521)经生李道胤写，用纸廿七张。”上海图书馆 812441 号《维摩诘经》末题：“神龟元年(518)岁次戊戌七月十三日，经生张凤鸾写。”这是一批专门从事写经工作的职业者。三是普通的民众。四是僧尼。在文献和敦煌卷子中多有披露，是抄经队伍中的主力。据《高僧传》里统计，魏晋南北朝时期